

第一辑



瞻顾文丛

城墙下的 夜游者

王彬彬 著

王彬彬

福建人民出版社



瞻顾文丛

城牆下的 夜游者

王彬彬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墙下的夜游者/王彬彬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 9

(瞻顾文丛)

ISBN 7-211-03939-6

I. 城...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8771 号

瞻顾文丛

城墙下的夜游者

CHENGQIANG XIA DE YEYOUZHE

王彬彬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0.625 印张 4 插页 213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211-03939-6

I·83 定价: 19.2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主催者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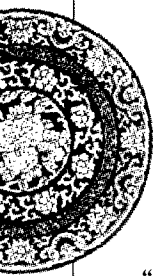


筹划本文丛时，出版社的编辑曾要我担任主编，我不敢当。“不敢当”并非佯作谦虚状的公关语言。我是个老脑筋，如果尸“主编”之名而不实干，那很无谓。要实干，那我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且不说能力。十多年前我曾当过一次上海辞书出版社《青年文学手册》的主编之一，经手的文稿从头至尾逐字细读不说，还得提意见、动手删改乃至整个条目改写，没人写的要自己增写，那苦头至今难忘。当然，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除我之外都是一时人选，用不着而且我也没有本事提意见，乃至妄加是正，可是光通读一遍，我也吃不消。空担名义，又何苦来！

当今出书，通行“策划”之名，我一想也不宜仿效。我能策划谁，谁又能听我的策划？而且，一提“策划”，还令人想起“策划于密室”这句不祥的话，有点小小的余悸。因此，我就提出，我可当“主催”。

“主催”一词是日本传入的，犹言组织人、发起人、召集人。三四十年代常用，近年来少见，以至一个年轻朋友曾为此而向我质难，以为是我杜撰，逼得我专撰一文以应。本文丛的作家多数是熟人，我的确又函又电，主过催；有的如于光远、严秀两位，我还苦苦哀求过，算是尽了主催之责的。

文丛的命名我曾征询过作家们的意见，邵燕祥曾提议以



“长春藤丛书”为名。考虑到有几位作家还很年轻，不全是老头，放弃了。于是由主催人定了“瞻顾文丛”这一不抢眼的平实的名称，文丛同人均无异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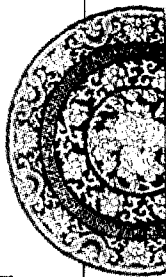
任何重要时刻和重大事件都该有认真的前瞻和回顾，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瞻望前途和回顾历史尤有其除旧布新的现实和观念上的郑重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不了解昨天和今天，就不能预知明天。”回顾过去、反思历史才能保证理性的前瞻，才能避免在空洞的“向前看”的口号下屡屡为纠缠人的历史所困扰，也是面对现实的最佳选择。

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长期以来都是本着良知、秉持公心地向社会执言者，他们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言谈多年来有广泛的影响。他们和曲学阿世者辈不相为谋，依我看，可以若干地代表社会、民族、人类的良心。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指陈和对未来的期望必将给读者提供独特的启示，更不说赏聆他们论辩中的优美谈吐的愉快。

各种丛书都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体例，但本丛书则完全是开放式的，自由不拘。至于各位作家的文风各异，那更不在话下。

主催人谨向加盟的各位作家致感谢之忱，并代表文丛的作家向读者致新世纪、新千年的祝贺。

NAD82/03



自序

平时读书,总习惯先看看前言后记,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写作情况,也知道一下作者对自己的书是如何评价的。读没有前言后记的书,像与人进行一场没有寒暄、没有开场白的谈话,会觉得有些突兀、有些不自然。可轮到自己出书了,却会为写前言后记而发愁。这时候,又觉得要说的话都写在书中了,再于书前书后来饶舌,实无必要。可见人扮演的角色不同时,想法也是大异的。站在或许会翻翻我这本小书的读者的角度上想想,觉得还是应该写几句话放在前面。

这仍是一本杂乱的集子。但与我已经出版的几本集子比,又稍稍“单纯”些,也即所谈的话题比较集中,所谓“文论”占了大部分。这一来是因为前几次出集子时,有意识地把一些谈文学的文章留了下来,打算在有可能时出一本清一色的文学评论集,这次,把这些文章大都收了进来。二来,则因为这两年我已在大学中文系谋生,总谈些与文学无关的问题,就该算是“不务正业”了,所谓“文论”也就多写了几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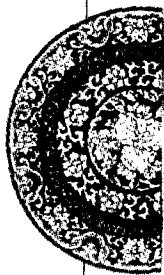
这套“瞻顾文丛”本要求入选的都是随笔,但我这本集子里,有好几篇都是又臭又长的所谓论文。这也因为近两年我随笔写得少。刚到大学教书,备课、讲课要花去不少时间,此其一。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必须去写长篇幅大部头的东西,以证



明自己是有“学问”的。这样,虽然不时有些适合于写成随笔的念头,也只能放弃。但这实在颇令我痛苦。

作文必长,方算学术;著书必厚,方显分量——此种观念之盛行,其原因探究起来是大有意味的。它本身已足以构成学术研究的对象,后世之人若写最近数十年的学术史,是不该绕过判断学术的这样一种标准的。按照这种标准,像朱自清这样的人,是不配称作学者的,更没有资格在清华这样的大学混饭,因为他的《语文零拾》、《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语文影及其他》等著作,实在都不过是刊于报端的随笔的结集,是很不“学术”的。按照这种观念,费孝通的只有六万五千字的小册子《乡土中国》,也无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乡土中国》所收文章,都不过几千字一篇,且行文平易亲切,既未穿靴戴帽,也不引经据典,在今天,这也只能算作是从有些人嘴里说出时颇带鄙夷之意的随笔。然而,费孝通却在后记里称这些文章为论文。想来费孝通是很珍爱这些文章的。他也有理由珍爱它们,这薄薄的一本小书,我从里面得到的启发,胜过许多大部头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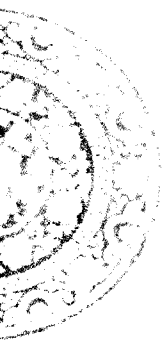
文章须长,出书应厚,此种观念在有些大学到了近乎荒谬的程度。例如,有的大学硬性规定,20万字以下的专著不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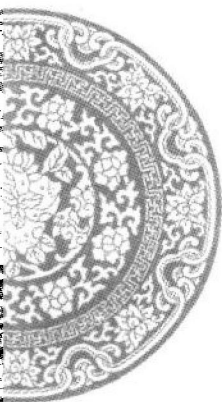


成果。按照这种规定,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自不用说,就是他老先生的那本《宋元戏曲史》(11万字)也不能为他挣得一个哪怕是副教授的资格。章太炎呢,仅凭他那本《国学讲演录》(16万字),能在今日大学里当个教授么?至于周作人这样的人,有什么脸面在北大这样的地方占据教席呢?他那本也只有6万来字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放在今日,能拿得出手吗?——对学术的这样一些僵死的要求,又往往是以“学术规范”的堂皇名义做出的。强调“学术规范”当然是有必要的。各行各业都要有规范,学术也不例外。但任何规范都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目的。体育运动员应该遵守比赛的规范,这样才能保证比赛能进行下去,但并不能认为一个从不犯规的运动员就是最优秀的运动员;汽车驾驶员应该遵守交通的规范,这样才能维持正常的交通秩序,但并不能说一个从不出事的驾驶员就是最杰出的驾驶员。但在今日学术界,却常有将规范变成目的的现象,似乎做学问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了遵守学术规范,只要遵守了所谓的“规范”,就被认可,就算成果。当所谓的“学术规范”(那常常是怎样莫名其妙的“规范”啊!)成为衡量学术的最高尺度时,有学术与无学术、真学术与伪学术,同样变得无从分辨。



1962年11月生，安徽望江县人。1978年参加高考，被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录取；1982年毕业后在南京军区工作。1986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学位；1989年直接升入同一专业博士学位攻读阶段；1992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到南京军区创作室工作。1999年转业到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已出版《在功利与唯美之间》、《死在路上》、《鲁迅晚年情怀》、《给每日以生命》、《独白与驳诘》等著作多部。





目录

瞻顾文丛

城墙下的夜游者

迷信科学与相信骗术

- 3 迷信科学与相信骗术
- 6 从检讨到罚款
- 9 土豆、牛肉及其他
- 12 “腐败”一词勿滥用
- 14 愚民的专制
- 31 批判传统文化仍是当务之急
- 39 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
- 48 平凡的能力与非常的影响
- 56 为 1989 年版《辞海》送行
- 64 词义的时代性

说不清楚的概念

- 69 说不清楚的概念
- 73 《知识分子》：一本哗众取宠的书
- 75 随笔集《太平杂说》与电视剧《太平天国》
- 79 《秋风秋雨愁煞人》
- 82 “小说化散文”
- 86 浮尘中的《文化苦旅》
- 88 金庸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 92 金庸：雅俗共赏的神话
- 109 怎样当“读作品”的批评家
- 112 “读书忌”
- 117 “文艺战线”
——兼谈文艺用语的军事化问题

何谓“思想家”

- 129 何谓“思想家”
- 132 在鲁迅止步的地方
- 137 鲁迅的脑袋与自由主义的帽子
- 144 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



目录

瞻顾文丛
▲

▲
城墙下的夜游者

162 鲁迅研究的价值标准问题

179 从“尾”谈起

——驳王德威《从“头”谈起》

194 政治全能时代的文学

——《十七年文学》论评

209 理解浩然

213 文艺创作中的仿效与创新

——甲与乙的对话

225 文学艺术中的进化观念与创新意识

——甲与乙的对话

城墙下的夜游者

239 城墙下的夜游者

——论毕飞宇的小说

252 “守旧”的勇气

——读小说《呼吸》

261 流氓的变迁

——谈王朔的小说

272 “圈外人”的文艺评论

276 茅盾奖：史诗情结的阴魂不散

282 遥望陕西文坛

288 关于当代文学的文化批评

298 文学与道德

——一个常识问题的重新提起

314 “风派”例解

317 随笔、文学、经济学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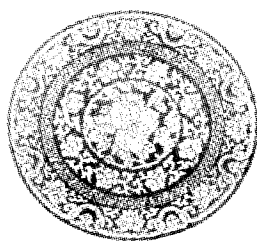
迷信科学与相信骗术

瞻顾文丛 ▲

▲ 城墙下的夜游者

瞻顾文丛 ▲

▲ 城墙下的夜游者



迷信科学与相信骗术

按理,正像水是火的克星一样,科学是迷信的天敌。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社会上的迷信思想和迷信活动,也将逐渐绝迹,种种江湖骗术,在科学知识得以普及的时代,也将不再有市场。然而,至少在中国,真实的情形却并非如此。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迷信思想和迷信活动非但没有走向消亡,相反,倒呈蓬勃发展之势,五花八门的江湖骗术也大行其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上愚昧荒谬之事层出不穷:竞相修豪华坟墓而使得青山白化,迷信风水而使得新盖的办公楼倒塌,相信臭水沟里是包治百病的“神水”而大喝特喝,相信法院的“公章”垫在鞋底便能逢凶化吉,等等。

面对这种现象,人们几乎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是因为对科学的宣传还不够。民众之所以还如此迷信愚昧,那是他们对科学还懂得太少,对科学的功能还了解得不够,要扼制和根除种种反科学和伪科学的东西,只有加大宣传科学的力度,让民众真正明白科学的伟大作用。然而这样的想法,其实经不起推敲。这些年,我注意到,那些迷信活动猖獗的地方,那些愚昧荒谬之事盛行的所在,往往并非那种很偏远之地,并非那种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区域。倒是那些经济较发达,民众的平均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时有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例如相信法院的“公章”垫在鞋底便能避邪,就发生在一个省会城市。作为今日的一个省会城市的居民,争抢着撕下法院的“公章”往鞋里塞,





认为这样便天灾可免，人祸能逃——你说这是因为缺少科学知识，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了。

那么，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我想，与其说是对科学宣传得还不够，毋宁说是迄今我们在对科学的宣传中，有着重大的谬误。不妨说，今日的反科学和伪科学的泛滥，一定程度上，正是我们长期以来对科学的不正确的宣传造成的。对科学的不正确的宣传，使得大众并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生活态度，倒是为他们走向反科学和伪科学提供了契机。

对科学的不正确的宣传，源于宣传者自身对科学有着不正确的认识。什么是科学，可以说人们长期以来对此有着普遍的误解。前些时候在《报刊文摘》上看到一篇《科学到底是什么》的文摘，摘录的是《中国青年报》上北野的文章，其中说：“科学到底是什么？在许多人眼里，科学仅是一种解决物质问题的实用手段，从清末的富国强兵，到现在许多地方搞弃人文，独重IT和理工的做法，都没有把科学看成是超越实用目的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我觉得这几句话实在值得深长思之。什么是科学？科学首先是一种超越实用目的的思想体系。而我们长期以来，都只对科学做一种非常狭隘的功利化理解。在对大众讲解科学时，也完全是一种功利化的宣传。在这种功利化的宣传中，又往往很自然地把科学神话化，宣称科学无所不能，只要“相信科学”、“依靠科学”，便能健康长寿，幸福无边。而将科学神话化，本身便走向了反科学和伪科学。而科学神话在大众心目中一旦破灭，江湖骗术，巫婆神汉，便有了可乘之机。去年一段时间，各种传媒有过一次宣传科学的热潮。在这种宣传中，神话科学的倾向非常严重。例如，一再举出正反两类病人的例子，一类迷信“歪理邪说”，不去医院就医，终

于病情日益严重,甚至命丧黄泉;一类相信科学,积极到医院就医,于是病情日见好转,终于康复如初。在举出的病例中,有些是科学也还束手无策的“绝症”。然而这样的宣传却似乎在告诉人们:科学包治百病,任何疾病,只要“相信科学”、“依靠科学”,都能彻底治好。——这样的宣传,本身就是很不科学的,与江湖骗术实在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一个被宣传得相信科学包治百病的人,当他跑了很多医院,花掉许多钱之后,仍然病痛如初时,他便很自然地对科学心生怀疑和厌弃,并转而到江湖骗子那里去一试运气。我相信,这样的例子,一定可举出很多。

倘若宣传科学者不能对科学有一种超实用的理解,倘若在宣传中仍热衷于制造科学万能的神话而不讲科学的局限,那么,这样的宣传,非但不能扼制和根除反科学和伪科学,相反,倒是在为反科学和伪科学的肆虐准备着条件。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对科学的迷信很容易造成对科学的敌意,科学的迷信变成一些否定科学的势力,因为它误认为这些势力可以扶助科学。谁要是相信科学万能,谁就会在专家面前不再运用自己的思考力,但当这些专家也无力解决问题时,他就会失望地离开专家,而走向真正的科学骗子。因此,迷信科学和欺骗术在本质上是类似的东西。”

(原载《中国文化报》2000年3月7日)





从检讨到罚款

前些时候,听说一位作家要写一篇文章,论中国的“检讨文化”。这可真是个好题目。但我又想,“检讨文化”应该是很晚近才兴起的。“检讨”一语,原本也只有调查、核对、研究、讨论之意。把自我批判,或者说得通俗些,把自己骂自己说成是“检讨”,该是历时并不太久的事。只不过,当“检讨”具有新的意思后,其原意倒隐而不彰了。

“文革”时期,是“检讨文化”的兴盛期。我现在每每看到商家们争抢着打出“集团”的招牌,就想到自己在“文革”期间因与“集团”沾边而被勒令“检讨”的痛苦经历。“集团”这个在今日很中性甚至还带些褒义的词,在“文革”时期却是很贬义且很敏感的。那年代,大大小小的“反革命集团”层出不穷,使得“集团”似乎必然与“反革命”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如此,那时人们对“集团”二字是避之惟恐不及的,谁要与“集团”搭上界,谁要被归入某个“集团”,那可就大祸临头了。而我就曾在那时与“集团”搭上了点界。那是在初中三年级时,我与班上的几个同学忽然都对另一个同学很不满,几个人在一起商议后,决定给他写封信,让他知道“我们”已联合起来与他为敌了。信由我执笔,我记得措词是激烈的。这同学接到信后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很长时间都令我不解。那天放学时,我们全班留下,班主任脸上刮得下霜来,说出的话也像刀子一般闪着寒光。他要求我们“这伙人”当场写检讨,当场宣读,检讨